

台湾商务印书馆

王云五 主编

古籍今注今译系列



礼记今注今译

王梦鸥 注译

礼记今注今译

王云五 / 主编 王梦鸥 / 注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记今注今译 / 王云五主编; 王梦鸥注译.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04-1841-9

I. ①礼…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礼仪—中国—古代②礼记—注释③礼记—译文 IV. ①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5855 号

礼记今注今译

主 编: 王云五

注 译: 王梦鸥

责任编辑: 韩 威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530 千字 印张: 36.75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841-9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新版《古籍今注今译》序

中华文化精深博大，传承颂读，达数千年，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当今之世，海内外，莫不重新体认肯定固有传统，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累积智能的价值，更获普世推崇。

语言的定义与运用，随着时代的变动而转化；古籍的价值与传承，也须给予新的注释与解析。商务印书馆在先父王云五先生的主持下，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选译批注数十种学生国学丛书，流传至今。

台湾商务印书馆在台成立六十余年，继承上海商务印书馆传统精神，以“宏扬文化、匡辅教育”为己任。六十年代，王云五先生自行行政院副院长卸任，重新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仍以“出版好书，匡辅教育”为宗旨。当时适逢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成《资治通鉴今注》（李宗侗、夏德仪等校注），委请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十五册，千余万言，一年之间，全部问世。

王云五先生认为：“今注《资治通鉴》，虽较学生国学丛书已进一步，然因若干古籍，文义晦涩，今注之外，能有今译，则相互为用，今注可明个别意义，今译更有助于通达大体，宁非更进一步欤？”

因此，他于1968年决定编纂“经部今注今译”第一集十种，包括：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后来又加上老子、庄子，共计十二种，改称“古籍今注今译”，参与注译的学者，均为一时之选。

台湾商务印书馆以纯民间企业的出版社，来肩负中华文化古籍的今注今译工作，

确实相当辛苦。七十年代，王云五先生承蒙层峰赏识，委以重任，担任文复会副会长。他乃将古籍今注今译列入文复会工作计划，广邀文史学者硕彦，参与批注经典古籍的行列。文复会与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携手合作，列出四十二种古籍，除了已出版的第一批十二种是由王云五先生主编外，文复会与国立编译馆主编的有二十一种，另有八种虽列入出版计划，却因各种因素没有完稿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另外约请学者注译了九种，加上《资治通鉴今注》，共计出版《古籍今注今译》四十三种。兹将书名及注译者姓名胪列如下，以志其盛：

序号	书名	注译者	主编	初版时间
1	尚书	屈万里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9年9月
2	诗经	马乘风（持盈）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年7月
3	周易	南怀瑾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4年12月
4	周礼	林尹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2年9月
5	礼记	王梦鸥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4年1月
6	春秋左氏传	李宗侗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年1月
7	大学	宋天正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年2月
8	中庸	宋天正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年2月
9	论语	毛子水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5年10月
10	孟子	史次耘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3年2月
11	老子	陈鼓应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0年5月
12	庄子	陈鼓应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5年12月
13	大戴礼记	高明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年4月
14	春秋公羊传	李宗侗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3年5月
15	孟子	薛安勤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94年8月
16	韩诗外传	赖炎元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2年9月
17	孝经	黄得时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2年7月
18	列女传	张敬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94年6月
19	新序	卢元骏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年4月
20	说苑	卢元骏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7年2月
21	墨子	李渔叔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4年5月
22	荀子	熊公哲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年9月
23	韩非子	邵增桦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2年9月
24	管子	李勉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8年7月
25	孙子	魏汝霖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2年8月
26	史记	马乘风（持盈）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9年8月
27	商君书	贺凌虚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7年3月

28	太公六韬	徐培根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6年2月
29	黄石公三略	魏汝霖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年6月
30	司马法	刘仲平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年11月
31	尉繚子	刘仲平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年11月
32	吴子	傅绍杰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6年4月
33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曾振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年9月
34	资治通鉴今注	李宗侗等	国立编译馆	1966年10月
35	春秋繁露	赖炎元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4年5月
36	公孙龙子	陈癸淼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6年1月
37	晏子春秋	王更生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7年8月
38	吕氏春秋	林品石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5年2月
39	黄帝四经	陈鼓应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5年6月
40	人物志	陈乔楚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96年12月
41	近思录、大学问	古清美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2000年9月
42	抱朴子内篇	陈飞龙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2001年1月
43	抱朴子外篇	陈飞龙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2002年1月
44	四书(合订本)	杨亮功等	王云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9年4月

已列计划而未出版：

序号	书名	译注者	主编	
1	国语	张以仁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2	战国策	程发轫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3	淮南子	于大成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4	论衡	阮廷焯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5	楚辞	杨向时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6	文心雕龙	余培林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7	说文解字	赵友培	国立编译馆	
8	世说新语	杨向时	国立编译馆	

1981年，文复会秘书长陈奇禄先生、国立编译馆与台湾商务印书馆再度合作，将当时已出版的二十九种《古籍今注今译》，商请原注译学者和适当人选重加修订再版，使整套《古籍今注今译》更加完善。

2009年春，“国家”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先生，约请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方鹏程研商，计议重新编辑出版《古籍今注今译》，并继续约聘学者注译古籍，协助青年学子与国人阅读古籍，重新体认固有传统与智慧，推广发扬中华文化。

台湾商务印书馆经过详细规划后，决定与“国家”文化总会、“国立”编译馆再

度合作，重新编印《古籍今注今译》，首批十二册，以儒家文化四书五经为主，在今年 11 月 12 日中华文化复兴节出版，以后每三个月出版一批，将来并在适当时机推出电子版本，使青年学子与海内外想要了解中华文化的人士，有适当的版本可研读。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努力。

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王学哲谨序

2009 年 9 月

重印《古籍今注今译》序

古籍蕴藏着古代中国人智慧精华，显示中华文化根基深厚，亦给予今日中国人以荣誉与自信。然而由于语言文字之演变，今日阅读古籍者，每苦其晦涩难解，今注今译为一解决可行之途径。今注，释其文，可明个别词句；今译，解其义，可通达大体。两者相互为用，可使古籍易读易懂，有助于国人对固有文化正确了解，增加其对固有文化之信心，进而注入新的精神，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上最受人仰慕之文化。

此一创造性工作，始于1967年本馆王故董事长选定经部十种，编纂白话注译，定名经部今注今译。嗣因加入子部二种，改称古籍今注今译。分别约请专家执笔，由云老亲任主编。

此一工作旋获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之赞助，纳入工作计划，大力推行，并将注译范围扩大，书目逐年增加。至目前止已约定注译之古籍四十五种，由文复会与“国立”编译馆共同主编，而委由本馆统一发行。

《古籍今注今译》自出版以来，深受社会人士爱好，不数年发行三版、四版，有若干种甚至七版、八版。出版同业亦引起共鸣，纷选古籍，或注或译，或摘要注译。回应如此热烈，不能不归王云老当初创意与文复会大力倡导之功。

已出版之《古籍今注今译》，执笔专家虽恭敬将事，求备求全，然为时间所限，或因篇幅众多，间或难免舛误；排版误置，未经校正，亦所不免。本馆为对读者表示负责，决将已出版之二十八种（本馆自行约人注译者十二种，文复会与编译馆共

同主编委由本馆印行者十六种)全部重新活版排印。为此与文复会商定,在重印之前由文复会请原注译人重加校订,原注译人如已去世,则另约适当人选担任。修订完成,再由本馆陆续重新印行。为期尽量减少错误,定稿之前再经过审阅,排印之后并加强校对。所有此等改进事项,本馆将支出数百万元费用。本馆以一私人出版公司,在此出版业不景气时期,不惜花费巨资重新排版印行者,实懔于出版者对文化事业所负责任之重大,并希望《古籍今注今译》今后得以新的面貌与读者相见。兹值《古籍今注今译》修订版问世之际,爰缀数语志其始末。

台湾商务印书馆编审委员会谨识

1981年12月24日

编纂《古籍今注今译》序

由于语言文字习俗之演变，古代文字原为通俗者，在今日颇多不可解。以故，读古书者，尤以在具有数千年文化之我国中，往往苦其文义之难通。余为协助现代青年对古书之阅读，在距今四十余年前，曾为本馆创编学生国学丛书数十种，其凡例如次：

一、中学以上国文功课，重在课外阅读，自力攻求；教师则为之指导焉耳。惟重篇巨帙，释解纷繁，得失互见，将使学生披沙而得金，贯散以成统，殊非时力所许；是有需乎经过整理之书篇矣。本馆鉴此，遂有学生国学丛书之辑。

二、本丛书所收，均重要著作，略举大凡：经部如诗、礼、春秋；史部如史、汉、五代；子部如庄、孟、荀、韩，并皆列入；文辞则上溯汉、魏，下迄五代；诗歌则陶、谢、李、杜，均有单本；词则多采五代、两宋；曲则撷取元、明大家；传奇、小说，亦选其英。

三、诸书选辑各篇，以足以表见其书，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学技术者为准；其无关宏旨者，从删削。所选之篇类不省节，以免割裂之病。

四、诸书均为分段落，作句读，以便省览。

五、诸书均有注释；古籍异释纷如，即采其较长者。

六、诸书较为罕见之字，均注音切，并附注音字母，以便讽诵。

七、诸书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书概要。凡所以示学生研究门径者，不厌其详。

然而此一丛书，仅各选辑全书之若干片段，犹之尝其一脔，而未窥全豹。及1964年，余谢政后重主本馆，适国立编译馆有今注《资治通鉴》之编纂，甫出版三册，以经费及流通两方面，均有借助于出版家之必要，商之于余，以其系就全书详注，足以弥补余四十年前编纂学生国学丛书之阙，遂予接受。甫岁余，而全书十有五册，千余万言，已全部问世矣。

余又以今注《资治通鉴》，虽较学生国学丛书已进一步，然因若干古籍，文义晦涩，今注以外，能有今译，则相互为用，今注可明个别意义，今译更有助于通达大体，宁非更进一步欤？

几经考虑，乃于1967年秋决定编纂经部今注今译第一集十种，其凡例如次：

一、经部今注今译第一集，暂定十种，其书名及白文字数如次：

- 《诗经》 三九一二四字
 - 《尚书》 二五七〇〇字
 - 《周易》 二四二〇七字
 - 《周礼》 四五八〇六字
 - 《礼记》 九九〇二〇字
 - 《春秋左氏传》 一九六八四五字
 - 《大学》 一七四七字
 - 《中庸》 三五四五字
 - 《论语》 一二七〇〇字
 - 《孟子》 三四六八五字
- 以上共白文四八三三七九字。

二、今注仿《资治通鉴今注》体例，除对单字词语详加注释外，地名必注今名，年份兼注公元，衣冠文物莫不详释，必要时并附古今比较地图与衣冠文物图案。

三、全书白文四十七万余字，今注假定占白文百分之七十，今译等于白文百分之一百三十，合计白文连注译约为一百四十余万言。

四、各书按其分量及难易，分别定期于半年内，一年内或一年半内缴清全稿。

五、各书除付稿费外，倘销数超过二千部者，所有超出之部数，均加送版税百分之十。

稍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制定工作实施计划，余以古籍之有待于今注今译者，不限于经部，且此种艰巨工作，不宜由独一出版家担任，因即本此原则，向推行委员会建议，幸承接纳，经于工作计划中加入古籍今注今译一项，并由其学术研究出版促进委员会决议，选定第一期应行今注今译之古籍约三十种，除本馆已先后担任经部十种及子部二种外，征求各出版家分别担任。深盼群起共鸣，一集告成，二集继之，则于复兴中华文化，定有相当贡献。

本馆所任之《古籍今注今译》十有二种，经慎选专家定约从事，阅时最久者将及二年，较短者不下一年，则以属稿诸君，无不敬恭将事，求备求详；迄今只有尚书及礼记二种缴稿，所有注译字数，均超出原预算甚多，以礼记一书言，竟超过倍数以上。兹当第一种之尚书今注今译排印完成，问世有日，谨述缘起及经过如上。

王云五

1969年9月25日

叙《礼记今注今译》

王云五先生为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选择了若干种足以代表中华文化的典籍，拟用现代的观点和语言加以注释，并作翻译；冀使多忙少暇的现代人，容易了解中华文化的实质；同时亦使先人的德业日新又新。当时，老先生把计划中的工作，分一部分让我们尝试；那就是现在写成的这一部《礼记》的今注今译。

说到《礼记》这部书，原只是儒家经典的一部分，而且，在早还只是那些经典中属于“礼经”的一部分。礼经的传授，倘依时代先后排列：西汉讲“仪礼”，东汉兼讲“周礼”；差不多到了三国以后才开始讲“礼记”。换言之：《礼记》一书之取得经典地位，是较晚的事。然而，《仪礼》《周礼》二书所记载的，都只是上古的礼俗仪式和一套理想的建国制度。仪式和当时的生活习惯关系密切，经过时移世变，即在儒家的理论上，亦认为可以“与民变革”的；更不消说，在现实生活中时有事实上的改变。因此，《仪礼》《周礼》二书所记载的东西，和人们的常识日渐疏远；差不多到了唐代，有的学者竟直率地承认它之“难读”。学者们尚且如此，则其他的人更可想而知之了。当然，这里面重要的原因，乃是那些仪文制度，多已不见于后代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亦渐不为一般人所了解。

如果要问儒者们为什么要记载而且传授那些不为后世所实行的仪文制度？这确是极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为后代执政者所尊重，即在于他们不但有淑世拯人的抱负，同时还想拿出一套可以实行的具体办法。只可惜他们生存着的时代很古，那是个农业的封建时代。他们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能选择参

考和可依据的生活行为资料，就只有那些现实的东西。他们在那种环境中，要依其理想来选择一套可以辅导人们走向健康幸福的生活之路，遂亦只有那些礼俗仪文了。那些礼俗仪文，由后人看来，虽有许多是落伍的，不合实际的；然而，这都无关紧要；而最要紧的，乃在他们欲借助于那些礼俗仪文以达成淑世拯人的理想。他们早就说过礼俗仪文可以随时变革，唯独不可变的，就是他们要用和平的教育的方法，造就每个人健全的心理和合理的行为。这样地，由扩充小我而为大我，由个人至于整个人类。这是他们的理想，亦即他们所称为“义”者。他们说：“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所未之有，可以义起也。”这不是说得十分明白了吗？“礼”是指那些礼俗仪文，而“义”则是他们的理想。

《礼记》在礼经中虽为后起之书，但所记载的，恰就是那种理想。理想不变，所以《礼记》不特不因时世的迁易而没落，反而显得后来居上的地位。自北宋时代，《礼记》便正式列为礼经之唯一要籍，而且一直相沿到了近代。在清代经学复兴期间，就有学者直认：《仪礼》《周礼》二书已不能复行于后世，但那两部书的“会通”，则在于《礼记》。质言之，《礼记》不但是打通《仪礼》《周礼》二书之内蕴的钥匙，同时亦是孔子以后发展至于西汉时代，许多孔门后学所共同宣说儒家思想的一部丛书。

《礼记》在经典中的地位既是如此，现在还要考察一下，关于这部丛书的实际状况，并借以说明我们所作的今注今译的大体情形。

从历史上看来，现存于《礼记》中的文辞，在西汉时代，即已常常被人引述，显然那是很早就有的典籍了。但是到了东汉，这部后来被称为“小戴礼记”的书，仍未见于正式的记录。所以它的流行时代，可能是在东汉中期。如今唯一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东汉末年由郑玄编注而成的这个本子。虽然在郑玄前后亦有人批注过这部书，而且郑玄编注此书时亦还引用过别的本子来校对，但这都只够说明那时已有此书；至于此书和流传至今的这个本子，是否完全一样？因文献不足，我们仍只能说：现在的这个本子，是郑玄编辑和注解的本子，而称之为“郑注礼记”，俾不至误。

郑注《礼记》，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继续为之作讲疏的人亦逐渐增多。到了隋末唐初，先是，陆德明整理经典文字，连带为《礼记》

本文作了一番校对文字音读的工夫；接着，孔颖达等人，又把郑注以下的许多讲疏，做了一番厘订的工作，编成所谓“礼记正义”。礼记正义和郑注《礼记》，大约在南宋初年被合成为一部书；那时，正遇上印刷术发达，因之，这部书乃得以不同的版式在各地普遍翻印流传。现在我们称为“礼记注疏”的。可说是各式版本中之一母本。此外，南宋人翻印的“郑注礼记”和近代从敦煌发见的“郑注礼记”之零星抄本，都可供参考之用。因为礼记注疏本，清代阮元曾经参用国内外所藏的许多版本和前人用北宋本校对过的记载，编为“礼记注疏校勘记”。这种附有校勘记的注疏本，种类非一，而我们用作今注今译的底本的，则是目前坊间翻印的石印本。

郑玄使用极简炼的文字为《礼记》作注；所以他的注语，全部字数，仅比本文多出千余字。孔颖达等人则相反地，他们用最详细的语句为“郑注”作说明。这样极简与极繁的“注”和“疏”，自古以来，被认为“双绝”，而阮元即据此而为之校勘，照理该是最完善的本子了。然而，如果要问：这本子究竟完美到怎样的程度？却是个很难肯定回答的问题，因为这里面还有好几层的关系：

第一，郑玄时代，他所据以作注的那个底本，是否完善，即已可疑。郑玄作注，同时虽很细心地用当时流传的其它抄本校对他所用的那个底本的本文，凡是经他看出显然有错的文字，便明白地记下某字“当为”某字；但亦有他不能断定的，于是就记下某字“或为”某字。仅从郑玄所记的许多“错字”看来，即已够说明他所用的底本并非十分完美的。而且他在注这《礼记》时，又似很匆促，有些参考的书籍，他没有看到。这在他的学生问答纪录里，已有交代。由今看来，《礼记》的本文，有许多地方亦散见于其它古书中。倘用其它古书互校，则又可见除了郑玄已发明的疑问以外，仍还有不少的疑问。这就是郑注《礼记》底本的实际情形。

第二，孔颖达等人疏解郑注时，所据用的“郑注礼记”，则又是经过三国六朝，数百年间辗转抄录下来的本子。我们单看陆德明所作的“礼记释文”，即可看出：他记下许多“本为某字”“或为某字”的字，往往和现在这本孔疏所用的字又有不同，这又可以说明孔疏所据的底本，亦非十分完美的。此外，本非郑注而乱入郑注中者，犹不在话下。

第三，现行的注疏本，虽经过多人校勘，但于《校勘记》所记载者外，仍可检出一些错字。更严重的是：郑玄的注语，却不见于现有的郑注中，偶因孔疏之引述，

始能于“疏语”中看到^[1]。然而，未经孔疏引述出来的，是否仍有脱落的“郑注”呢？这就不无可疑了。再者，倘依孔颖达等人详为“郑注”作疏证的原则；而现在可看到的，有些地方必然有疏语的，但这“注疏本”却一字不提^[2]。这是否说明了“郑注”有脱落，甚至连“孔疏”亦有脱落呢？则又不无可疑了。有了这层层疑问，不特使人不能肯定回答这本“礼记注疏”的完善程度；而且，在替它作今注今译时，还不得不分外审慎；因为这些地方，前人尚未及注意。

如果要问：《礼记》既是千余年来的经典而为读书人必读之书，不可能有这种不可靠的成分在。因为此书于本文之外有注语，注语之外有疏语，层层说明，互相保证，决不致有什么大错。然而，大错虽必没有，只是在我国“一字一义”的文章结体中，片词只字的出入，就会影响整个的语意。郑玄最早便已注意到片词只字的是非；到了孔疏，他们虽极忠实地为郑注作疏解，但亦尝发见郑玄为本文上的错字所蒙混而写下望文起义的曲解。孔疏以下，经历宋元明清，许多热心攻读此书的学者们，差不多随时都在发见郑注以及孔疏的错失。虽其中有因错字而发生的；但最多的地方，还是在于“语意”的误解。从后代学者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郑注”误解了本文的地方，又看到“孔疏”误解了郑注的地方。这样的，由本文而注语而疏语，本意虽在于层层说明，而实际却未必即可互相保证。因此，自宋代以下，有的学者或竟撇开注疏，而径向本文作“直解”或“别解”的。这样一来，使那将近十万字的礼记本文，便附着上“数以千万计”的解说了。其中除去复述别人的意见者外，具有真知灼见的著述，即不在少数。现在我们为说明《礼记》本文而作今注今译，在探讨前人的意见时，虽不因其著述之多而感到困难；但是，他们太多不同的，甚或相反的，而又同具价值的解说，在选择取舍上，便不能不煞费踌躇了。

孔颖达等人之疏解“郑注礼记”，是罗列前人的意见然后加以仲裁（名曰正义），

[1] 例如《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孔疏引“檀弓之幼名者，三月为名，称幼”。今按《檀弓》实无此文，当是《檀弓上》“幼名，冠字”处之郑注语。今此郑注语不见于《檀弓》篇，赖孔疏所引而得见之。

[2] 例如《曲礼上》“不辞让而对，非礼也。”郑注云“当谢不敏，若曾子之为”。按今本此处不见孔疏语，遂亦无以知何者为“曾子之为”。疑此处孔疏当引《孝经》云：子曰：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等语，今佚之。

而其仲裁，即又代表一种意见。到了后代，读者愈多而意见愈加纷歧。但纷歧到了无从仲裁，就只好编为“集说”了。不过，如卫湜的“礼记集说”，卷帙浩繁，无法使其书与大众接近，当然，这不是我们“今注”所宜采取的方式。其次如陈澧的“礼记集说”算是要约而不繁了，然而他的集“说”，必须参看后人给他做的许多辨惑补正的著作，始不至跟着错误。而且，这种补正的意见，时在增加。清代学者更能利用文献学的、文字学的、语法学的种种方法，为“注”“疏”“集说”做下不少补正的工夫。如果把许多意见罗列起来，不免又要成为卫氏“集说”那样的庞然大物了。这都是作“今注”时所面对着的麻烦。

还有比这更加困难的事；第一，上古的一些特殊仪式、器物、建筑，以及社会组织上的种种名词：有的须表演，有的须绘图，有的须长篇讲解，始能看得明白。倘若单用“白话”，而白话中没有相当的词汇可以翻译。第二，本文的涵义，既有种种不同的解释；解释既已不同，当然不容“混说”。然而“今译”之目的，是要把本文一句是一句地用白话说来，倘求其不陷于偏执，就只好把不同的解释列于“今注”项下，而“今译”仅能就其中之一面翻译。这又是无可奈何之处。现在为着补救上述第一第二两点缺憾，我们就尽量刊载参考书籍，把权威的著作，演礼图，近代人所作名物图考等等，作为附录，以备有兴趣作进一步研究此书的读者参考之用。

最后，不，应当说是首先，我们得向王老先生表达歉意。因为老先生的委托，我们未能如期完成。虽然老先生原谅我们译注此书，因篇幅较长而参考的材料甚众，爬罗剔抉，刮垢摩光，既需时日；而本人又因外出讲学，逆旅生涯，亦略有耽搁。其间，还感谢罗宗涛、张棣华、谢海平，诸位年轻朋友热忱协助，如今幸得杀青斯竟。既得诸朋友的助力，所以在这里应称为“我们的”工作了。

早在郑玄时代，卢植曾经说过：“今之礼记，特多回穴。”我们虽不能指实他说的即是这部“礼记”。但细检此书，其中无论文字、章节、讲义，以及其牵涉到古代文化生活各方面的记载，皆因传世久远，本文断烂，章节错乱，字词讹脱，确实够称“特多回穴”的。所以我们的今注今译，只算是在前世学者的余荫下略尽绵薄。至于如何使得此书更其系统化，而赋以现代的意义，则有待海内外贤达的指教。

王梦鸥谨叙

1969年4月